

■新作聚焦

李舫散文集《纸上乾坤》：

岩中花树

□彭程

迄今为止，李舫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，都体现出了一种宏阔而超拔的气质。在她新近推出的散文集《纸上乾坤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）中，家国、社稷、天地、人心、使命、担当……这一类的“大词”，屡屡闪现于篇页字行之间，仿佛大风掠过浩野，雁阵飞越长空，挟带了一股特别的气势和力度。

唐人有云：“士之致远者，当先器识而后文艺”。文章写成什么样子，与写作者的抱负和识见密切相关。在本书的跋中，李舫这样写道：“我对于自己的定位，就是一个以笔为刀、为剑、为玫瑰、为火炬的作家。以一己之力，遥问苍穹。”有一种豪气干云的气概。以仰望浩瀚苍穹为目标，自然不肯流连于家门口小巧精致的花园。因此，与许多女性作家的柔婉、清丽和空灵相比，李舫的文字中却鼓荡着一股酣畅丰沛的须眉之气，既开阔激昂，又沉潜凝重，给人颇为深刻的印象。

通常情形下，话题的分量与作者所着眼的题材有很高的关联度。不同的题材，蕴蓄感受、激发思想的幅度是不同的。对于历史题材的钟情，是李舫散文突出的标识。古代知识分子也即“士”阶层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史迹，尤其成为她的目光聚焦之点，她放飞情感、驰骋思想的浩荡原野。苍穹是空间的无限放大，而历史则是时间的充分延伸，是另外一重意义上的苍穹，让她遥望和叩问，每有斩获。

于是我们到了《春秋时代的春与秋》。以史籍记载中公元前5世纪孔子和老子的会面对话为起点，文章梳理了儒家和道家的形成和发展。作为中国本土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，它们在其后2000多年中形成了华夏精神的基本版图。它们仿佛天地间的阴阳二气，物理世界中的正负电荷，互为对立又互为补充，“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，激荡着中国文化延绵不绝、无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样。”在《千古斯文道场》，她让思绪飘向2300百年前的齐国“稷下学宫”。以其自由、开放和包容的气度，这里吸引了天下的知识分子，诸子百家汇聚一堂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参政议政，畅言无忌，“一时间，战国学术，皆出于齐”。与以后漫长岁月中的思想一统、言路禁锢的严酷局面相对照，它的存在堪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，千载之后依然令人感喟不已。

从这些文章中，也可以充分地认识作者运思的方式。不论是情感的吟味还是思想的抉剔，她都不满足于在局部和表层止步，而力图获得一种扩展和深化，尽管面对历史的浩瀚体量，任何进入的方式从本质上讲都是零碎单薄的。譬如描写一棵大树，有人致力于描绘躯干的粗壮，有人寄望于画出树冠的茂密，她尽管也可以这样写，也能写得精妙，但她内心最在意的，其实还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画出一棵树的轮廓和体量，以及体现出这棵树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。这种对于整体性的追求，便造成了一种恢弘的格局，让文字也更有分量。

不过，对作者来说，对于历史的瞩目，最重要的还是为观照和衡量现实，提供一种镜鉴，说得更直白一些，是古为今用。阅读中，我仿佛看到这样一个画面：她在眺望被遮蔽于时光烟云深处的人事事迹时，总是适时地把目光抽回来，回返到当下，定睛一番，然后重新投送出去。正是在这样的往还梭巡中，连接古与今、历史和现实的无形管道变得清晰生动起来，相互之间有了印证和呼应。你会想到诸如“日光底下无新事”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之类的说法。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，便是忧患意识的真切表达。比如《千古斯文道场》，她念兹在兹的是弥漫于稷下学宫中的那种自由高蹈的精神，是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，以及壮志得酬的良好政治文化生态。《在火中生莲》中，韩愈以贬谪之身，处瘴瘠之地，仍然不改初衷，爱民如子，视民如伤，努力造福一方，获得潮州百姓赞誉，更以其道德人格力量，给后世的为官者树立了标高。也是在跋中，她表达了对写作意义的认识，“以笔、以命，以爱、以思，铺展历史的长卷，讴歌生命的宽阔”。正如书名《纸上乾坤》所喻示的，心中有眷念，眼前有天地，落笔到纸面上，才会有乾坤激荡，风生水起。

历史和文化的无疑是李舫散文写作的重要资源，因此，说她是一位学者型作家，应该不会有人反对。但书中的其他一些作品也让我想到，如果她为自己确定了另外一条路径，仍然也值得期待。这一点从《黑夜走廊》中可以看出。与前述作品相比，它呈现出了一种堪称殊异的审美面向。源自个体经验的丰富的、具有多义性的感受，飘忽朦胧，难以名状，和幽暗暧昧

“李舫的散文体现出了一种宏阔而超拔的气质。她的文字中鼓荡着一股酣畅丰沛的须眉之气，既开阔激昂，又沉潜凝重。

她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内在规律性的深刻理解，也正可以看作对其作品所呈现的丰富表现力的一个说明。从语言到文体的跳荡和不拘一格中，不难看到这些不同艺术形式、尤其是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的表现手法的潜隐的影响。”

的夜色正相谐适。理念以一种暗示的方式寄寓其间，缺乏坚实明朗的形体，但也因此增进了阐发的空间和弹性。同样是浓郁的诗意表达，在《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》里，则是一种幅度更大也更为舒展的呈现。广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在作者心中唤起的是对于大自然和历史的敬畏，那是一种混沌而复杂的意绪：“在这充满神奇的寂静之中，谁能说这片刻不就是永恒？谁能不领悟这巨大的空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时间？”写下这些只是想表明，对于作者来说，一种均衡发展的才具，使其写作具备了通向更为广阔的空间的可能性。

这样的禀赋，也让她有效地规避了文化散文中容易出现的审美缺失的弊端。的确有不少这一品类的作品，读来固然不无智性理趣的收获，却欠缺美的享受。但在这部散文集中，美的展现却是缤纷而摇曳。字词的推敲，句式的讲究，节奏韵律的布设，都鲜明可感。书中有多篇文章，



写到了画家、雕塑家、音乐家、电影艺术家等不同门类的艺术家，与他们所献身的艺术的亲密而紧张的关系，艺术对他们生命的成就和伤害。但且撇开这些不谈，我想说的是，她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内在规律性的深刻理解，也正可以看作对其作品所呈现的丰富表现力的一个说明。从语言到文体的跳荡和不拘一格中，不难看到这些不同艺术形式、尤其是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的表现手法的潜隐的影响。

忽然想到了王阳明与友人那一段著名的对话：岩中花树。这些年，王阳明的心学已经成为显学，这一用来阐释“心外无物”的典故也变得广为人知。但此处我援引这一桩公案，并非谈玄论道，仅仅是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考虑，觉得将这个画面感极为鲜明的意象移来，庶几能够概括李舫散文的品质。作为其主要作品内核的思想的厚重，观念的清晰，具有一种岩石般坚实的饱满的质感。而旁侧那一株枝叶纷披的花树，灼灼其华，照眼欲明，则显然可以比拟其艺术表达的摇曳多姿。理性和诗情，坚硬和柔软，质朴和华丽，沉静和飞扬……我们有理由对她今后的写作有更高的期待。

■评论

“史传创作”的价值与意义

□章罗生

作。“史传报告文学”主要是指新时期以来涌现的，以历史题材为主、兼有某些“传记”与“散文”特点的纪实文学创作。这一文体不但发展快、数量大、影响广泛，而且也涌现了众多成就显著的作家，如叶永烈、陈廷一、张正隆、王朝柱、邓贤、张建伟、王树增与金一南等。张雄文以其内容独异、特色鲜明的7部长篇显示出深厚的内在潜力。在描写粟裕与“黄埔系”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：视角更独特，人物更集中，即通过聚焦粟裕等“人”与黄埔军校等“事”，从一特定角度透视了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国共两党、两军的关系史与斗争史。

张雄文的史传创作，除文学史价值外，还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。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远落后于创作，纪实文学更是如此。因而，人们对当今迅猛发展的“纪实”现象莫衷一是。我认为，当前的纪实文学创作，在整体上表现出主体虔敬、守真求实、题材庄重、情理融通与文史兼容等特性，我们可以此为标准来认识与评价纪实文学。

所谓“主体虔敬”，指的是作家必须具备真正知识分子所有的正义良知与责任担当，能坚持真理，坚守社会公道。也就是说，真正为人民写作的作家，必须具有爱憎分明、不怕牺牲的“硬骨头”精神。而新时期以来纪实文学创作最可贵、也最令人钦佩的，是它将这种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这一点，在问题报告文学与史传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。张雄文继承和发展了前辈作家的传统，其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“主体虔敬”与可贵的“硬骨头”精神。

这一点，集中表现在对粟裕这一题材对象的选择以及对对其人生厄运的“鸣冤叫屈”等方面。或者说，作者之所以以系列长篇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对粟裕进行反复叙写，不但是因为对粟裕丰功伟绩与高尚人格的敬仰，更是出于对其被错误批判与被历史歪曲的不平。

在“文史兼容”方面，张雄文的创作也有较鲜明的独到之处。他以粟裕为中心，兼及毛泽东等其他将帅，从一特定角度，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、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态等。《蒋介石的枪杆子》从黄埔军校与“黄埔系”的特定角度，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集团与军队等进行重新解读，从而使人对中国现代历史与国共关系等，又有新的深刻认识与独特感受。而在“文”的方面，他以众多典型事例与细节，从各个不同侧面集中描写粟裕这一人格高尚、才能出众的杰出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鲜明形象。

总之，张雄文的“粟裕系列”等史传创作，继承叶永烈、陈廷一与张正隆等人的传统，不但为当代史传报告文学等创作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，而且为中国特色的纪实文学理论建构，提供了有意义的丰富资源。

但张雄文的史传创作，也存在着如何进一步增强其文体意识与精品意识等问题，“粟裕系列”虽然合起来表现了立体的粟裕“全人”，但分开来看，却有各自的不足。如《无冕元帅》对粟裕的张扬过于强烈、外露，其“宣传”重于“文学”；《战场上的粟裕》与《多是横戈马上行》等虽对人物与事件的描写较具体、清晰，但叙事重于写人，“军事”多于“世情”；而《名将粟裕珍闻录》与《眼底吴钩：说不尽的粟裕》虽重人生故事、典型细节与趣闻轶事，但又多少人生舞台上的正面大戏及剧情发展、演进的内在联系。它们在文体上都不是标准的“正传”，而属“杂传”、“史传报告文学”或人物散记之类。虽然这种文体杂糅的现象在当今文坛普遍存在，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是以人物为中心者，都应“以人为本”、“以人带事”，注重典型细节与性格描写，并尽可能将描写与议论、文学性与理性等有机融合。如此，才能优势互补，形成“合力”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史传之作。

逝者如斯夫

□李舫

很多很多年前的一天，坐在绿皮火车上，我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今天看来可怜巴巴的一点现金，怀揣着青春，怀揣着梦想，奔赴遥远的大海。父母给了我一个浪漫的名字，而我呢，乘着这浪漫的赐予，泛若不系之舟，虚而遨游。

火车呼啸着一路向南，窗外是万马奔腾般的远山，在巨大的云影里闪烁、腾挪。火车在每一个小站放下一批陌生的乘客，接上一批更加陌生的乘客。

突然之间，科拉齐尼的诗飘荡在我的耳边——“你为什么叫我诗人/我不是诗人/我不过是一个哭泣的孩子/你瞧，我只有洒向沉默的眼泪/你为什么叫我诗人？”

如果说时间也有年龄，那一定是历史上最青春的年代——这一年，马塞尔·普鲁斯特24岁，保尔·瓦雷里24岁，詹姆斯·乔伊斯17岁，帕斯捷尔纳克15岁，卡夫卡11岁，威廉·福克纳8岁，海明威6岁，肖洛霍夫和萨特呱呱坠地，还有一年，塞缪尔·贝克特也将出生……他们将改写世界文学的历史格局。而这个叫做科拉齐尼的病怏怏的少年，也许是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一个。

这是岁末的冬季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呼啸着奔驰而去。时间，究竟是什么？其实，就是我们手心流出的水滴，是荒漠中暗逝的流沙，与新知旧雨的一次握手拥抱，是讴歌生命的一次把盏言欢，是孔夫子锥心泣血的笔墨，响遏行云の呼号、掷地有声的追问——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！

不远处，电影《一代宗师》的海报已经泛黄。

花繁柳密处拔得开，才是手段；

风狂雨急时立得定，方见脚跟。

时间，也许更是一代宗师“花繁柳密”的武林手段、“风狂雨急”的江湖脚跟。在无数个刀锋扑面而来，闪烁在令人窒息的时间碎片里，儿女情怀，时代风云，武林快意，在雨滴烟横、雪落灯斜处，淡淡晕染。天下之大，一块饼到底是是一个武林还是一个世界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，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而心忧天下的情思。家国罹难，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怎能声声入耳？兵燹遍野，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又如何事事关心？韶华似水，流年永逝，弹指之间，千年往矣。所谓大时代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选择，其实，更是一个人的选择。

时间，是一个无影无形的武林，有家仇有国恨，有颠覆有赓续，有其顽冥固守的规矩，也有其念念不忘的深情；江湖之远，有侠义有磨砺，有使命有担当，有其博大隽永的人生况味，更有其时代轮转的历史法则。

时间，于我而言，更像一只被烈日烤干的蜗牛，蜷缩在我的掌心；而我，如同一个只知耕耘、不问收获的愚笨农夫，拾笔数十年，码字、敲字，却从未想到将这些颗颗粒粒整理收仓。感谢朋友们的敦促，我在三四台电脑、五六个抽屉里找到零零星星的文字——它们有些是字迹不清的手稿，有些是硬盘扇面里残存的碎片——集合起来，忘心地送到编辑的案头，期待读者的审判。

我的这些年，逝者如斯夫。文字的世界里，自是一个时代、一片江湖，其中有喜有悲，或饱满丰盛，或枯索飘摇。鲁迅曾云，所谓作家，是世界上最苦的事。恰如其言，以笔之力量掘采爬梳，字字可见血泪与光明。

我对于自己的定位，就是一个以笔为刀、为剑、为玫瑰、为火炬的作家。以一己之力，遥问苍穹。而我对作家的定义，就是智慧和担当，作家以笔、以命、以心、以爱、以思，铺展历史的长卷，讴歌生命的宽阔，时而悲怆低回，时而驻足仰望，在暗夜里期冀星辰，他们宛如子规长歌，恰似啼血东风，幽微中鑫鑫宏阔，黯淡里喜见光明。他们用作品和心智发言，恰恰因为有了这些环绕在我们身边的问与答，才有了试图挣脱枷锁、排解苦难的伟大历程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这是我的日常生活，也是我关乎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道，其中的趣味和悠然，不言自明。

无数个365个日日夜夜转瞬即逝。是的，委顿于泥土之下的，是时间的背影；至今仍挣扎于我们内心的，则是时代背影之外的无声吟唱。

■新作快评

王方晨中篇小说《农夫吁天录》，《芒种》2018年第3期

乡土的质朴与癫狂

□严程

在王方晨的《农夫吁天录》里，时间与空间被刻意含混，故事发生的村庄，也没有一个名字，它呈现出的却是无数中国式乡村每日上演的悲喜闹剧。一件光棍娶亲、寡妇再嫁的小事，在荒芜而闲散的熟人社会里总能衍生出无数怪谭。王方晨的语言游离于压抑的底色和亢奋的人物之间，显得冷峻克制而又纤毫毕现，以不动声色的书写，切入荒芜乡村中的人性之恶。

40多岁的老光棍腊八人有些懒，又常受嘲弄，可是愿意为侍寡媳赡养前夫留下的老人，是个淳朴善良又有点窝囊的乡村老实人。龙虎兄弟有着农人身上常见的执拗与惹动儿，挨打时只会说一句“别打俺俺没得罪谁”，却又常常奚落矮小瘦弱的腊八。他们之间的矛盾，来自于人性中的阴暗一隅，然而一次娶亲为何能引发如此巨大的波澜？

当下乡村女性的稀缺与成年男性的性压抑，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。小说里处处是这种压抑的欲念，时而直抒胸臆“龙快憋死了”，时而具象成臭烘烘的豆豉味、冷得像铁的棉被、一盘死蛇般的井绳。而单身了几十年的腊八，一面深为自己娶到媳妇的幸运窃喜，一面又在龙眼中灼灼的火焰里败下阵来——腊八的失败与龙的压抑，恰如对称的两面，共同指向挣扎在乡村底层的男性的悲哀。正如文中所言，婚姻于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是“要出人命”的大事。

如果仅仅把传统与现代夹缝里的乡村热点问题写成小说，故事到腊八和龙的对峙便已经完成了使命。如果说腊八的乡村是木讷而质朴的，龙虎的乡村是癫狂而执拗的，那么猫来的乡村却近乎鲁迅笔下的鲁镇，不那么残酷，反而更加真实，带着每一座村庄都熟悉的油滑与狡诈。

与龙虎兄弟和腊八不同，猫来有闲钱，有家室，是有资格“玩一玩”的。于是自始至终，把腊八引来听龙的吃语，撺掇龙臆想“把谁的媳妇还给谁”，向虎打听众人心思不成竟随口编出腊八磨刀杀人的消息，眼看众人失了兴致又转而让老婆言之凿凿地劝服秀琴……猫来在困倦的日光下，悠然消遣着腊八夫和龙虎兄弟，看似无甚要紧，却一步步造就了平庸之恶。而这些谣言与挑唆发生之处，也都是水井、草垛这样的公共场

合，仿佛就是每日上演的好戏。与之相对的，腊八与龙虎兄弟几次直接对垒，却都是在夜里，发生在腊八院里或龙虎兄弟家中，带着熟人之间的私密与戏谑，甚至有虎陪着腊八一起哀哭这样奇异而质朴的温情。

王方晨着墨未多的看客，却在这冰山一角般的对话里，显出可怖的力量。对老实人司空见惯的言语欺凌，也在平庸之恶的挑唆下，一点点变为使人癫疯发狂的执念。他们把腊八说得无心着家，半夜里游魂似的来到龙虎兄弟家；又把龙说得“相信自己身上存在着一种吸引所有人走到他跟前的力量”，像鲜花簇拥的花蕊。然而花瓣如此脆弱，“弄不好要出人命”的警醒一瞬间摧毁了听众的兴致。兄弟俩亢奋至极，甚至要去接佟家婆婆而未果。看客们一哄而散，龙却陷入癫狂，荒唐而执拗地坚定他的冤屈，欲念也终于爆发为可悲又可笑的“发狂一吼”。《农夫吁天录》独出心裁的题目，便是为这个讽刺的结局，再添一层没有温度的反讽。

在凝滞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社会里，权力与道义从来只是弱者的希冀。然而在蒙昧荒芜的底层，也并没有所谓强者，只有狡诈与无赖的乡村生存法则。王方晨笔下的乡村一如既往的冷酷而荒诞、锋利而疼痛，正如他笔下的小人物一如既往地交织着善与恶，挣扎与徒劳。

在如今看似透明的乡村现实面前，王方晨的写作引领读者暂别对乡村浮光掠影似的“猎奇”观览，转向对乏味乡村情境的真实体验与触摸。这一转向使得读图时代的阅读不再停留于内容和情节，而是转向对故事背后潜藏的人性与权力政治的思考。以《农夫吁天录》为代表的这一类小说，为小说在视觉媒体时代的去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

现实比小说家笔下的世界更荒诞。用以对抗这种荒诞的冷峻笔调，是王方晨审视这个世界的滤镜。面对在城市化面前迅速消亡和荒芜的乡村，王方晨是双向的，一面以鲁迅式的悲悯与沉重，鞭挞着它的困阨，一面又要站于当下人文关怀的语境里思索它的未来，两者之间，微妙地保持着均衡，构成了作家“其言诡谲，其义恢诞”的文学场域。